

# 馬國華人與民主演變： 族群政治建構出的群體意識

利亮時、彭婉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授兼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專案計畫研究助理

從被稱作「華工」到稱為「華僑」，然後到現在的「華人」，可看出「移民」此行動之身分的轉換，對一個群體的身分、種族以及文化認同，是能影響一個移居地國家的機制運作。華人族群的群體身分之轉換當然是隨著東南亞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與政策來作改變；很明顯地，現在東南亞各國的華人都有各自不同於以往的中國華人意識與文化面貌，更產生出不同的各國華人群體意識。

2018年的馬來西亞政治轉型，代表著長期以來「非馬人」對於族群政治的挑戰成功，並在2018年取得成果，這也是因為得到部分馬來人的支持。這次選舉結果其實不僅為單一族群的抗爭，而是多元族群對於國家族群政治的反省。本文想以馬來西亞的華人群體意識之發展現況，結合社會學理論和馬來西亞政治歷史之演變，來談國家政策對於華人融入國家社會（群體）之影響。再以馬來西亞族群政治之歷史演變，探討近年來民主政治之轉型對馬來西亞人民，特別是華人的群體意識影響為何？

**關鍵詞：**民主、馬來西亞、族群政治、華人、選舉

## 壹、導論：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認同與群體建構

在歷史上，在「華人」(Chinese, Ethnic Chinese, Chinese Diaspora) 這稱謂用法出現之前，從中國移居他國的中國人多稱為「華僑」(中國僑民之意)。二戰以後，國家民族主義興起，移民族群因政治認同的轉變和生活需要，「華僑」逐漸被「華人」兩字所取代，僅是表示自己在該國家的族群身份。從海外的華文刊物中，可發現「華人」用詞書寫之轉變，本文認為此用詞的概念，意味著對於海外華人而言，海外移居地已成為他們的定居地。

在 20 世紀 1950 年代前，「華僑」泛指海外中國移民及其後裔，在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為定居國外而擁有中國國籍者；1950 年代後，海外中國移民及其後裔則多改稱為「華人」。<sup>1</sup> 以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在「知識與意欲」演講文中談及由勞動和權力關係構成的社會制度，會影響人與人在追求互相瞭解的基本能力，例如溝通工具、語言、文字、肢體動作等。<sup>2</sup> 能理解馬國華人從英殖民政府到現在馬來人主政的政府，皆因為社會制度的關係，華人並非為掌握最大優勢的社會族體，進而影響馬來西亞嚮往的民主潮流，一直無法真正取代長久存在的族群政治。以馬來西亞政權歷史來談，哈伯瑪斯的社會制度幾近於社會學家涂爾幹 (Durkheim) 在社會實體中論述的制度 (法律)。

<sup>1</sup> 莊國土，《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化》(廈門：廈門大學，2003)，頁 14-23。

<sup>2</sup>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92)，頁 4。

涂爾幹將社會實體分為「物質性社會事實」<sup>3</sup>和「非物質性社會事實」<sup>4</sup>，本文將其論述簡言為「社會結構的變遷會改變一個群體的歷史思維基本結構」。<sup>5</sup>

主觀的集體意識之形成、塑造，類似於社會學理論常論及的「集體的的心理狀態」，與涂爾幹談及的「物質性社會事實」（語言、宗教、血統）之間，無可避免地產生相互影響與聯繫關係。以東南亞華人而論，他們的主觀意識是藉由整個華人社會在東南亞歷史中的共同演進而成的，在這段歷史中，必須以最初的血統關係、氏族關係連結到民族生存的歷史，以及祖先、神的崇拜，為一環結一環的。<sup>6</sup>

隨著東南亞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政策改變，現在東南亞各國的華人都各自現今不同於以往的華人意識與文化面貌，以及產生

<sup>3</sup> 涂爾幹「社會實體」論述的「物質性社會事實」分為（1）社會：原既有的初民社會反應在語言、文化上。（2）社會的結構組成成分：結構成份會受族群、信仰等影響。（3）社會的型態成分：社會中人口密度（以族群分之）、溝通管道（本文將其意指為人民與國家的溝通方法、機構）、居住區域配置（分成族群混居、族群集中，或按國家法律規定而居之）。

<sup>4</sup> 涂爾幹「社會實體」論述的「非物質性社會事實」為四個部分；（1）道德依國家教育或家庭教育產生個人差異。（2）集體意識：在歷史過程中建構出的族群意識有共同信仰或情感意識。本文認為可視為集體心理學或集體動力，為一種無形的意識感受。（3）集體表象：特定的集體之規範與價值；似於在集體意識產生作用（亢奮）下而創造出的規範（表徵），可視為集體意識的具體狀態或基體。（4）社會潮流：涂爾幹主張社會潮流是無中生有地，降臨到集體中的每一個個體，而且能夠無視個體意識的存在，將個體意識帶進集體意識。

<sup>5</sup> Ritzer George, 馬康莊、陳信木合譯，《社會學理論》（臺北：巨流，1995），頁172。

<sup>6</sup> 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北京：三聯，2015），頁237-245。

不同的各國華人群體意識。本文想以馬來西亞的華人群體意識發展現況，用社會學角度和政治歷史之演變來談國家政策對於華人融入國家社會（群體）之影響，以及馬來西亞近年來的民主政治之轉型對華人群體意識的影響。

## 貳、文獻探討

### 一、馬華意識之轉換與崛起

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單一組成族群（ethnic group），除了客觀上具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文化或共同的歷史經驗，同時主觀上具有福禍與共的集體認同。研究族群關係的學者大致認為在族群認同的形成過程，共同的歷史經驗多於明顯的共同特質，一個的族群存在與否取決於國家成員的主觀意識，甚至「主觀意識」是可以想像出來的。<sup>7</sup>

以族群認同理論的「工具論」論之，馬來西亞族群動員的最大動機為危機感；馬來人自殖民時期以來，長期處於被殖民國家壓榨的生活之中，在爭取獨立時，將華人、印度人帶入為與馬來人一樣被殖民、受壓榨的「非白種族群」，這樣的族群認同亦可謂是各族群菁英為了競爭有限的資源而建構的，因為爭取獨立的政治聯盟需要動機，動機就是因為他們的共同福祉正面臨挑戰，因而產生集體的不滿或相對的剝奪。

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緊接著是進入國家的資源分配階段，此時，族群認同又「再一次」動員，但族群被強迫分為「馬來人」、

<sup>7</sup> 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前衛，1998），頁2-4。

「非馬來人」；族群菁英期待由動員獲得集體或選擇性的好處，比如政治權力、物質上的報酬、安全保障或尊嚴。

可是自 1969 年至今，族群關係的緊張並未因馬來西亞政府的政策干預而消弭，政策反而成為族群不滿的原因，政府的政策造成馬來西亞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關係，比如在政治、經濟、教育或文化上的壓迫、支配、剝削、歧視、排斥，皆令非馬來族群強烈感受不平等的剝奪感。<sup>8</sup> 面對如此國家機器的支配，馬國華人集體意識因而產生轉變並出現分歧；部分華人可能會消極地採取逃避或接受命運的安排，而另外一部分華人的族群菁英會採取在共生的共識下取得政治妥協，進一步對國家做政治訴求，但並非所有的「退一步」（妥協）皆能得到族群「進一步」的發展。

施正鋒認為國家內部屬受壓迫的少數族群，其對國家所作的訴求策略可分為三大類：平等權、文化權與財產權及政治訴求。<sup>9</sup> 因此國家是可以具有分配資源、提供正當化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功能（工具）的；從馬來西亞獨立歷史來分析，本文認為馬來族群菁英在爭取獨立時，已開始意識到馬來族群可以透過「國家」這個工具取得資源（也就是國家機器的主導權——行政部門、軍隊、政黨），甚至是利用「國家」支配其他非馬來族群以得到更多的利益。現在的馬來西亞已往極端現象發展，國家已成為某個支配性族群所有；換言之，馬來西亞國家雖實行民主制度，但少數族群是無緣真正參與政治的，等同於組族群黨的自由早已形同虛設。從爭取獨立至 1969 年，馬來西亞的巫人與華人菁英間的結盟成功維持了協和式的民主，以強調共識為由，以「協商精神」實行馬來西亞民

<sup>8</sup> 國家機器往往被用來壓抑少數族群的文化傳統或生活方式，尤其是運用支配性族群在教育、媒體、宗教的控制，比如禁母語、獨尊官方語言的作法。

<sup>9</sup>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頁 14。

主政治，放棄一般的多數決，採取比例原則來淡化族群意識，此協和式民主使馬國華人接受被理想化的馬來西亞民主政治。惟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卻讓馬國華人意識到消弭族群隔閡的民主政治並未成功存在過。因為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是將壓迫或歧視以制度（國家政策）去實施。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宗旨是以族群作分貧富階級，以政策力量去壓迫其他非馬來族群，認為所有馬來人因為過去被殖民的困苦，因此皆有權利取得較多資源，其他族群並不迫切需要國家資源。但整體國家的社會現實卻是生活困苦、貧窮的人並非都是馬來人。

起初的政治聯盟，其理念為馬來西亞華人帶來對國家滿懷的期待，隨著現實上的不平等關係越趨嚴重，相對地，會更加激起華人族群集體的不滿或相對的剝奪感。馬國華人的意識昇華速度日以倍增，所以並非所有的聯邦制度都是用來化解衝突，國家可以試圖淡化族群意識，反之，也能加深族群界線，加重族群之間的衝突。

## 二、馬華的國家認同之演變

在 19 世紀初和其他海外華人一樣，馬來亞<sup>10</sup> 華人有著保存華人文化認同的強烈願望，這可以從他們的生活中顯現出他們對華人身份的強調，在飲食方面，食物取向依然不同於馬來亞其他族群，他們穿的衣著亦屬華人服裝，住家、店鋪的建築皆與原先在中國的

<sup>10</sup> 「馬來亞」一詞，在二戰前是指當時的英屬馬來亞半島，包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麻六甲與檳城）、馬來聯邦（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及彭亨等四州）和馬來屬邦（吉打、玻璃市、丁加奴、吉蘭丹與柔佛等五州）三區。二次大戰後，殖民政府就政治因素，將新加坡從馬來亞分割出來，變成了兩個政治單位。因此在二戰前，馬來亞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一個區域統稱。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亞、沙巴、砂勞越和新加坡合併而稱為馬來西亞，在 1963 年以前並無「馬來西亞」這個名稱。

建築風格相似，目的就是想保有華人身份表徵；但在馬來亞定居的華人相對地也面臨多元文化的衝擊，例如西方國家（英國）的殖民文化與馬來西亞主要族群巫族的社會文化。<sup>11</sup>

顏清煌在《海外華人的社會變革與商業成長》<sup>12</sup>一書中提及早期馬來亞華人移民是毫無政治觀念的，主要原因是這些移民受的教育程度大多不高，甚至有些是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他們對於政治方面，基本上是認為力有所不及，有些則是漠不關心，只求能夠在異鄉生活順遂。隨著中國內部出現一些改革的力量，當時的維新派與革命派，除了在中國宣揚本身的政治理念外，亦在海外，包括了在東南亞的中國移民社群內傳播。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直接對馬來亞華人產生影響，在當時華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跟中國連接，並非馬來亞（移居地）產生的。

前言提及哈伯瑪斯「社會制度」會影響一個群體思維的發展：在1970年代，哈伯瑪斯另提出「溝通行動理論」，強調語言的使用會對一個國家、社會影響甚鉅。<sup>13</sup>

二戰結束後，東南亞各國紛紛脫離殖民地獨立，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必須認同所居國家，因為作為居住國公民，須依法履行對社會的職責，融入當地社會，為國家發展作貢獻；另一方面，作為華人，必須保持自己的種族與文化認同，因為關係著族群自身整體的利益問題。所以華人融入當地主流社會，並不是以族群消失為代價，而是對國家履行公民職責，尊重當地其他族群的同時，堅持自己的文化特徵，以國家的繁榮、進步為目的來融入社會。然而，這

<sup>11</sup> 顏清煌，《東南亞華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2008），頁315-322。

<sup>12</sup> 顏清煌，《海外華人的社會變革與商業成長》（廈門：廈門大學，2005），頁176-184。

<sup>13</sup> 黃瑞祺，《批判社會學》（臺北：三民，1996）。

樣的理想追求，對於馬來西亞華人，未能得到正向發展，馬來西亞華人所訴求的民主政治，因為一項項的國家族群政策頒布後，反而無法得到國家當權者的支持，最後演變成現在馬來西亞族群的政治對立情況。

學者王甫昌認為在祖先來源多重而且混合的狀況下，族群認同的持續，不一定需要固定不變的族群本質；比較重要的是對於族群界線存在的認知，即使界線本身也是可變的。<sup>14</sup> 以王甫昌的觀點來談馬國華人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其實是沒有為馬國華人造成任何的矛盾，族群界線並不妨礙馬國華人對於國家的認同，且對於文化的認同可視國家情況而改變，兩者是可以融合的。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就是新馬兩地華人在 1950 年代，倡建一所中文的大學 - 南洋大學。華人此舉並沒有得到祝福，反而是引起英殖民政府，馬來人社會的反對。馬來亞獨立建國後，馬來人推動的逐漸式的一元文化與教育政策，顯然是要弱化華人的文化認同與堅持，這亦導致族群對立一直都是無解的。

吳祖田在〈馬來西亞的族群衝突與整合〉一文也認為馬來人的特殊地位會致使同為公民的華人、印度人在政治、文化、教育、商業活動等方面受到相對的剝奪，接著因法律而產生的剝奪感、壓制感，會更進一步地成為馬來、土著與非馬來、非土著之間族群衝突的基本因素。<sup>15</sup>

從馬來西亞教育亦可看到該國華人的身分困境；以馬來族群為眾的歷史教科書之編排，多以「華族南移」的論述來談華人身分，<sup>16</sup>

<sup>14</sup> 王甫昌，〈第八章：臺灣的族群關係研究〉，收錄於王振寰主編，《臺灣社會》（臺北：巨流，2002），頁 245-246。

<sup>15</sup> 吳祖田，〈馬來西亞的族群衝突與整合〉，收錄於邵宗海、楊逢泰、洪泉湖編撰，《族群問題與族群關係》（臺北：幼獅，1995），頁 256。

<sup>16</sup> 葉玉賢，〈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初中「歷史科」教科書之分析（1973-2007）1：一個馬來西亞華人「中國性」轉變之觀點〉，《課程與教學季刊》13，4（2010）：159-187。



將看待華人的方式以「外來勞工」的解讀教于馬來西亞年輕學子，並談及英國的殖民經濟之剝削方式如何將勞力帶入馬來亞，華人與印度人在馬來亞有什麼貢獻，及身分地位有什麼差別；對於華人在馬來亞的開發之貢獻，在歷史教科書中是無任何詳細論述的，多以幾句描述句就結束華人對馬來亞的開發歷史。不難看出馬來西亞的國家機器是如何管制歷史中族群的敘述方式。早在馬來西亞爭取獨立之初，制定憲法之時，就已埋下族群間不平等的衝突種子，<sup>17</sup> 因政府給予馬來族群的特殊地位，不僅是保障馬來人的身分權力，相對的，對其他族群而言，憲法（國家機器）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壓制其他族群在馬來西亞的發展，最明顯的第 153 條憲法是直接用「規定」，將「非巫族群」變成追求「馬來西亞各族群平等」訴求中的不平等公民。

這種方式無助於馬來西亞國家的團結，反而產生一股推力，讓華人在文化堅持上更為堅定，因為馬來人在政策上的排斥，無法讓作為國家一份子的華人得到最起碼的尊重，甚至產生剝削感。

官方史觀之外，華人亦對自身族群歷史有其論述，此也為華人自我解構的一種，固然歷史是多面向建構而出的，有華工、華商、華僑、華人等不同身分的解釋與其歷史背景，都可以看出華人對自我身分的心理層面之認同建構；亦也可解讀出華人在認同自我身分時，對於「中國」渴望的程度之變化。此解讀也會反映在馬國華人怎麼用「維持傳統」來展演自我身分。華人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其主要在於抗衡馬來人的一元化政策，這種狀況造成馬國華人無法

<sup>17</sup> 1957 年馬來西亞聯合邦的第 153 條憲法，規定最高元首有責任在其認為合理的情況之下，確保公共服務（公職）、高等教育機構（接受訓練的特權）、獎學金等保留名額給馬來人（巫人、土著），以及商業和專業的執照也須依照配額制度予馬來人。

完成在地化的過程，當中國崛起之後，馬國華人亦逐漸出現強調自我華人身份的趨勢。這是在東南亞較特殊的例子，當中華人在馬來西亞的人口數，長期建立的文化系統（學校、會館、報館等）成為一股抗衡國家政策的力量，並成為鞏固馬國華人社會的基礎。

以陳國賁所談的文化碰撞理論<sup>18</sup>中的「強化」(Essentializing)和「創新」(Innovating)用於此來分析，能更清楚了解過去、現在的馬國華人文化認同，以及未來馬國華人社會演變與發展的可能情況。<sup>19</sup>馬來西亞歷史中出現的「513事件」便是族群之間無法達到和諧的溝通所產生的衝突事件；就是陳國賁談的強化(A↔B = A / B)，雙方文化的「碰撞」使得A和B都更加強化自我，甚至退回各自「保壘」，漸漸就會出現所謂的種族偏見和歧視。此型態的文化碰撞結果就是導致衝突發生，甚至可能發生武力屠殺的情況。移民讓馬國華人充滿緊張不安，他們通過自身所有的調整功能來減輕焦慮和不安，這種功能持續不斷地創造新的社會型式；「強化」、「交替」。

另一種文化碰撞理論的「創新」(A↔B = AB or Ab or Ba、C)則是由於不同文化的衝撞，其個體會出現迷茫不安、矛盾，而雙方就可能會出現新的C文化。以馬來西亞主政的馬來族群與華人族群來論之；在文化碰撞的第一階段，A（馬來族群）為了捍衛自己的領土或資源而必然對B（華人）有強烈的敵意，將之視為陌生的「侵略者」。這是族群界線「邊境危機」的第一步。將不同於自己的人視為陌生人，並與之保持距離。人類本性即是如此。在文化碰撞的第二階段，是A（馬來族群）的進入導致與B（華人）的衝突，

<sup>18</sup> 陳國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衝突和融合〉，《浙江學刊》2（2005）：154。

<sup>19</sup> 陳國賁將「移民」個人的文化碰撞理論分為五種型態：強化（Essentializing）、交替（Alternating）、改宗（Converting）、混成化（Hybridizing）、創新（Innovating）。

airiti

伴隨著 B（華人）的政策要求以及隨之而來的 A（馬來族群）的政策壓制。在這一階段中，衝突與矛盾即產生，雙方的紛爭只有發展到第三階段，才能由一種力量獲得解決，這種力量即所謂的「碰撞—融合」（impact-integration）或「新生文化」（emergent culture）。<sup>20</sup>

現在馬國華人在國家認同上是毫無疑問的，國家認同始於二戰結束之後，當時世界陷入冷戰的局面，另一方面，在 1950 年代初期，英殖民政府看到馬來亞的獨立，已成為一個不能逆轉的事實，因此調整了許多殖民政策，為馬來亞的獨立做好準備。1951 年 9 月 30 日後，英國殖民下的新馬兩地與中國斷交，原因之一是防止新馬在邁向自治與獨立的道路上遭共產勢力竊據。大環境的轉變，對華人社會都構成某種程度的影響。

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奮鬥，不少華人在馬來亞紮根多年，自己奮鬥的心血和家人都在這塊土地上，這種緊密的關係，使他早已經把馬來亞視為「第二故鄉」。自 1951 年新馬和中國大陸斷交後，華人意識到他們無法返回中國，促使他們的認同從「落葉歸根」轉向「落地生根」，把馬來亞這個居留地視為永久故鄉。華人體認到馬來亞的生活與文化環境，畢竟和中國大陸迥然不同，融入當地社會成了迫切的問題。為了族群自身的權益，華人社會的社團與政黨，開始向英殖民政府進行爭取華人公民權的運動。另一方面，亦呼籲華人關心和參與政治事務。在獨立之後馬國華人無論在身分方面還是心理層面，皆已成為馬國國家的公民。而文化認同的部份，本文認為已到文化碰撞的「碰撞—融合」或「新生文化」階段，也就是馬國華人的族群意識和族群認同的界線仍在不斷地變化，而控制這條界線的是由華人群體建立出來的社會組織，而組織又會因國家政治發展情況而隨時變化著。

<sup>20</sup> 陳國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沖突和融合〉，《浙江學刊》2（2005）：155。

在東南亞影響華人與土著民族關係是多方面的，例如華人與土著的經濟地位差距，或是不同的宗教文化習俗。但華人與當地族群的大規模衝突，大部份不是因宗教問題或差異所而引起的，而是來自於經濟實力的差異和意識形態的歧異。<sup>21</sup> 近年來，各個國家的華人已與移居國的其他非華族群，各族群之間的社會關係已逐漸改善，華人基本上已經成功地融入了移居國社會。可以馬國而言，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問題，並無在獨立建國之後獲得改善，反觀，因為工具（國家政治）受單一族群掌控，其國內的族群主義意識正不斷在升長。1965年新加坡被逼退出馬來西亞，其中族群關係就是因素之一；1969年的種族流血衝突，更加導致族群之間關係的惡化。再經過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表面上是促進族群融合，實際上卻為更加深了馬來西亞各族群之間的界線。

綜上論述，馬國華人一直受困於族群政治的框架內，不管政治、教育、經濟都被族群政治所束縛。馬國華人亦嘗試用民間力量，挑戰在政治上的權力爭取，然而族群主義所產生的族群政治卻成為馬國華人理想的民主政治最大阻力。馬來人是馬國最大的族群，其長期在族群主義的控制下，族群內部形成一股對本身族群利益的捍衛力量。從馬來族群的角度來看，固然是有利於族群中的某一群人，但是這對華人與其他非馬來人則形成排他性。本文認為這種族群關係，繼續演變下去是不利於國家之發展，例如2018年馬來西亞在國家政策下產生的民主政府，於2020年隨即因族群操控導致的政府之重組，此更證明了馬來西亞的民主已演變為僅利於單一族群的民主政治；此國家政治的演變與發展，亦是將華人等其他非馬來族群逐步地邊緣化。

<sup>21</sup> 莊國土，《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化》，頁10-14。

## 參、族群政治下的馬國體制

二次大戰結束後，馬國的最大族群：馬來族群為了族群的利益，於 1946 年 5 月 11 日成立了「全國巫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以下本文簡稱之為「巫統」。1946 年成立的巫統，曾在創黨之初有機會成為一個多元族群的政黨，但是由於馬來亞族群之間的階級不勻均，階級理念無法整合當時的族群關係，多元的路線無法得到黨內的認可，巫統最終選擇成為一個僅為馬來民族權益奮鬥的政黨。多元路線的失敗令巫統創黨人拿督翁 (Dato Onn bin Jaafar) 選擇離開巫統，另組一跨族群的「馬來亞獨立黨」(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接替拿督翁的東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由他領導的巫統與拿督翁的馬來亞獨立黨，開始兩黨競爭未來的政治路線。

進入 1950 年代，民族自決的浪潮席捲亞洲，代表馬來人的巫統、華人的政黨馬華公會 (簡稱馬華,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與印度人的馬來亞印度國大黨 (簡稱國大黨,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三黨組成了「聯盟」(Alliance)，積極爭取獨立，以及參加當時英殖民政府舉辦的各級選舉。巫統、馬華與印度國大黨締結的聯盟，在多次選舉中擊敗拿督翁領導的政黨，這也代表著族群政治路線戰勝多元族群路線。聯盟在 1955 年選舉的勝利，奠定三黨在獨立後的統治地位。三個政黨代表的是各自族群的利益，馬來亞建國後的政治亦是沿著族群的政治道路發展。

從 1957 到 1969 年，聯盟一直是馬來 (西) 亞的主要執政黨。221969 年在野黨勢力的崛起，令執政聯盟面臨極大的挑戰。執政聯盟雖成功保住了中央執政權，但在國會議席上所佔的數額卻

<sup>22</sup> 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亞與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合併稱為馬來西亞。

有所減少，更不幸的是該次選舉後，馬來西亞國內發生種族衝突事件。這次的衝突事件「513事件」，導致巫統主席兼首相東姑阿都拉曼黯然下臺，副手敦拉薩（Tun Abdul Razak）取而代之。

敦拉薩的上臺，開始向在野黨伸出橄欖枝。在野黨在敦拉薩的拉攏下，紛紛加入聯盟。敦拉薩成功「收編」在野勢力後，開始改組聯盟，並將聯盟更名為國民陣線（簡稱國陣）（Barisan National Front）。在野成員加入了執政團隊，並沒有對馬來西亞原本的族群政治生態產生改變，反而讓族群政治繼續壯大與發展，巫統的力量亦隨著增強，更加確立往後族群政治的發展。在本文之前所提及的「集體意識」便在此開始產生強大作用力，以涂爾幹談及的「物質性社會事實」：語言、宗教、血統來論，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就是從族群之間的政治衝突中鞏固起來的。

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之確立有其許多歷史背景，在英殖民政府統治的期間，採取對馬來亞各族群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各民族之間漸漸產生隔閡。在當時馬來亞政壇尚未出現任何政黨能與聯盟抗衡的情形下，聯盟順利從英殖民政府手中取得了政權。繼承英殖民政府的「單一選區簡單多數當選制」，用以強化聯盟的執政基礎。

在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成功獲得獨立，1959年則是建國後的第一次全國選舉。這次的選民結構產生了頗大的變化，非馬來人的人數大幅度增加至三成左右。<sup>23</sup> 聯盟中的政黨成員——馬華曾要求增加國州議席的分配，但是遭到巫統斷然拒絕，巫統主席東姑阿都拉曼更不惜以斷盟來捍衛巫統的地位。馬華最終的妥協，雖然可以繼續享受執政的權力，但是這也間接地強化巫統的領導地位，馬華、國大黨與巫統間的關係，亦由對等地位逐步演變成從屬的角色。

<sup>23</sup> 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1997），頁69。

airiti

獨立建國後，在野力量開始逐步崛起，尤其是左派政黨所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線，他們以階級的論述來吸引選民的支持。然而，階級論述的幼苗無法在族群政治下發芽。其原因在於，左派中的族群色彩仍然明顯，華人是內部的中堅，這也成為無法取得最大族群「馬來人」信任的因素之一。在剛脫離英殖民政府獨立之初，強調以族群為本位的聯盟體制，是唯一得到三族認同的政治團體，這讓聯盟能夠擊退左派的挑戰，以及進一步鞏固其統治的地位。在 1959 年至 1964 年的兩次國會議席選舉中，便可以看到這種趨勢。1959 年的國會選舉，聯盟在反對黨的挑戰下，席位有所減少，但仍維持三分之二的優勢，即在 104 席中取得 74 席。<sup>24</sup> 1964 年的國會選舉，<sup>25</sup> 聯盟贏獲 89 席（當時競選的國會議席共 104 席）。<sup>26</sup> 聯盟在國會議席的增加，固然有許多因素的影響，而其中一項就是當時人民對聯盟執政有信心。

聯盟在 1964 年的國會選舉，雖然得到人民的強大委託，但是該屆選舉多元族群政治再次與族群政治角力。標榜多元族群政治之政黨是由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派出候選人競逐半島的國會議席，雖然只贏得 1 席，但是人民行動黨欲跨越柔佛海峽進入馬來半島（亦稱西馬）權力中心的意圖，令聯盟心生警惕。選後人民行動黨繼續高舉「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旗幟，開始向聯盟的族群政治進行挑戰。多元政治與族群政治的較勁掀開了政治鬥爭的序幕。聯盟主席東姑阿都拉曼知道無法掌控全局，在各方勢力的壓力下，最後選擇驅逐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

<sup>24</sup> 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 (1955~1995)》，頁 76。

<sup>25</sup> 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西亞正式成立國會議席因而增席至 159 席。1964 年的國會選舉只限於馬來半島，當時的國會議席數額仍與 1959 年選舉時相同，即 104 席。

<sup>26</sup> Ratnam, K. J and Milne, R. S. *The Malay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of 1964*.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14.

新加坡獨立建國，亦象徵族群政治再次取得勝利，讓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紮根更深。而「新馬分家」的事件，對馬來人與非馬來人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在馬來人方面，人民行動黨的動作，加深了他們的不安和恐懼；從非馬來人的角度來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挫敗，令他們從認命轉為憂慮。這兩股情緒，亦在不斷累積能量，並在數年後引發了一場政治與族群的危機。

在馬來西亞爭取獨立建國的整個過程是成功的，至少讓政府維持 12 年狀似平和的議會政治，直到 1969 年 5 月，隨著各個族群菁英開始分裂，個人利益、族群利益開始凌駕於國家發展利益之上，整個國家才開始意識到馬來西亞為獨立而產生的聯盟政治是失敗的。

馬來西亞於 1969 年迎來了全國第三屆大選，選前執政聯盟是相當樂觀，並預測可以如以往般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國會議席。執政者的信心是基於與印尼、菲律賓的領土衝突已獲得解決，國家在國際的局勢已趨漸穩。並在選舉提名的當天（1969 年 4 月 5 日），聯盟在 19 個國會選區中獲得不戰而勝的佳績。<sup>27</sup>

這些訊息都增加聯盟對 1969 年大選的信心。該屆選舉，聯盟面對幾個主要在野黨的挑戰：「泛馬回教黨」、「民主行動黨」、「民政黨」、「人民進步黨」和「馬來亞人民黨」。開票結果中，聯盟在半島的 104 席國會議席（總議席是 144 席）中獲得 66 席，再加上原本不戰而勝的 19 席，已經超過半數並順利取得執政權，即使東馬（砂拉越、沙巴兩州）之成績尚未揭曉。聯盟已基本上已經再度獲得執政權，但是無法掌握「三分之二」的多數優勢；開票的結果與聯盟的預估有頗大的落差。

在州選舉方面，聯盟在馬來半島的多個州屬亦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敗。1969 年的選舉對聯盟而言，是心理上的挫敗大於實質的

<sup>27</sup> 〈全國大選報導〉，《南洋商報》1969.4.6。



airiti

挫折，馬來族群的不安更令選後的局勢變得不平靜。聯盟在州選舉的表現頗不理想。聯盟不但喪失了檳城（Pulau Pinang）和吉蘭丹（Kelantan）兩州的執政權，在丁加奴州（Trengganu）也以勉強過半的議席保住州政權。在雪蘭莪州（Selangor）和霹靂州（Perak）這兩個聯盟的堡壘，竟無法奪下過半數的多數議席。在雪蘭莪州，聯盟只取得 28 個州議席中的 14 席；在霹靂州的 40 席中，聯盟只拿下 19 個州議席，使得聯盟在兩州都無法籌組州政府，而在野黨亦無法有足夠席位成立州政府。這種選舉結果之局面所蘊涵的不穩定性，正是「513 事件」爆發的原因之一。

聯盟的兩個主要成員黨「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黨」，在這次選舉中遭到城鎮的非馬來人選民的唾棄，是導致聯盟遭到挫敗的原因之一。當時首都吉隆坡的 4 個國會議席，皆分別落入在野黨：「民主行動黨」和「民政黨」的 4 位候選人之手。<sup>28</sup> 在野黨在吉隆坡選舉中的勝利，令兩個在野政黨的支持者沉浸在選舉勝利的喜悅中。5 月 11 日選舉成績揭曉後的當天傍晚至第二天晚上為止，兩黨的支持者在吉隆坡市區舉行喧鬧而充滿挑釁意味的「勝利大遊行」，又繼以無數的小規模遊行。<sup>29</sup> 另一方面，兩黨的青年支持者向當時雪蘭莪州務大臣哈侖（Harun bin Haji Idris）位於拉惹姆特路（Jalan Raja Muda）的官邸前進，毫不客氣的促哈侖搬離官邸（聯盟無法組成州政府）。非馬來人在這些遊行中的種種無禮舉動，顯然是認為並強調著巫統在雪蘭莪州的挫敗，也是馬來人的間接失敗。<sup>30</sup>

<sup>28</sup> 〈事件報導〉，《南洋商報》1969.5.12。

<sup>29</sup>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The May 13 Tragedy*.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1969), pp. 29-35.

<sup>30</sup> Goh, Cheng Teik, *The May Thirteenth Incident and Democracy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0-21.

在野政黨支持者的舉動使得多數馬來人的憤怒情緒達至極點。5月13日傍晚，巫統雪蘭莪州分部發起一場反制性的大遊行，遊行群眾在預定出發的時間之前，即因聞獲吉隆坡文良港區（Setapak）的馬來人被華人攻擊之傳言，而失去了控制並開始蜂擁至華人聚居的鬧區，攻擊、砍殺路人並縱火焚燒華人的商店與車輛。在這個過程中，華人和印人也開始糾眾反擊，於是暴動終於爆發。<sup>31</sup>

1969年5月13日爆發的種族流血衝突事件中，首都吉隆坡首當其衝，各族群的人民均有死傷。據當時的非正式統計，首都的暴亂進入第二天之後，喪生人數已經超過30人，而受傷的人數也達至110名左右。<sup>32</sup> 這起衝突事故，按官方事後統計，喪生人數共196人（華人143人，馬來人25人，印度人13人，其他種族15人），受傷人數共439人（華人270人，馬來人127人，印度人26人，其他種族16人）。<sup>33</sup>

1969年10月8日全國行動理事會發表報告書，詳述「513事件」的來龍去脈及將來應對的方案。該報告書的內容是根據「馬來西亞」就是「馬來人國家」的立場，來指責非馬來人這些外來移民，如何不守本份，如何不肯向馬來政治權威及文化效忠和認同，以致引發馬來人的猜忌造成種族衝突的悲劇，最後主張把憲法中有關種族關係及馬來人特權條文（第153條）視為「已被深切及堅決制定的條文」，不准加以任何質疑；並主張以這些條文作為基礎以來

<sup>31</sup>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May 13-Before and After*. (Kuala Lumpur: Utusan Melayu Press, 1969) pp. 94-95.

<sup>32</sup> 〈事件報導〉，《星洲日報》1969.5.15；〈馬來西亞513事件〉，《星暹日報》1969.5.15.；Berita Harian 1969.5.15；The Straits Times 1969.5.15.

<sup>33</sup>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1969, *The May 13 Tragedy*.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1969) pp. 88-90.

恢復民主憲政。<sup>34</sup> 1970 年以後，馬來西亞官方文書以「土著」及「非土著」來畫分種族，導致土著一詞被廣泛使用，使得因族群關係而緊張的多數馬來西亞國人順勢被推入族群二分情形的強烈對立社會。

為了聯盟的永續執政，敦拉薩上臺後，在內是整頓聯盟，對外則是積極拉攏各州的在野政黨。經過四年的努力，各地的在野黨紛紛投向聯盟陣營。敦拉薩亦在 1974 年 6 月 1 日宣告成立國民陣線，成員除了聯盟的三黨外，更增加了回教黨（中文譯名後改為伊斯蘭黨）、民政黨、人民進步黨、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砂拉越聯盟各黨，使得國陣成為一個多黨的執政團體。

國陣的成立，對馬來西亞的政治有著多重的意義。一是瓦解了在野的勢力；二是削弱馬華與國大黨的代表性和政治力量；三是執政組織的重整，巫統是國陣團隊裡頭的最大得益者，該黨由聯盟的「一大二小」，變成「一大多小」的局面；最後則為因 1974 年國陣的成軍和「513 事件」的夢魘，更加強化了馬來西亞族群政治建構出的民主制度。

經歷 1969 年的「513 事件」後的第一次全國大選，新成軍的國陣取得大勝，在 154 席的國會議席中，得到了 135 席。<sup>35</sup> 壓倒性的勝利，加速了以馬來人為主之政策的推動，族群政治成功渡過危機，而且更趨穩固，多元政治的力量幾乎消失殆盡。敦拉薩於 1976 年逝世後，繼任的胡申翁（Hussein Onn），以及後來的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都在敦拉薩推行之政策的庇蔭下安坐江山。1978 年，1982 年和 1986 年的選舉，國陣都是輕鬆過關，形成了獨強、獨霸的局面。

<sup>34</sup>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1969, *The May 13 Tragedy*.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1969 ) pp. 82-87; *Berita Harian*, 1969.10.9 and 1969.10.10.

<sup>35</sup> NSTP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Elections in Malaysia: A Handbook of Facts and Figures on the Elections 1955-1986*. (Kuala Lumpur: NSTP, 1990) pp. 55-61.

族群政治與政策歷經了敦拉、胡申翁與馬哈迪三位馬國領導人的鞏固，已經成為一個固若金湯的城堡。然而，族群政治令馬國競爭力衰退，引發了許多民生的問題。馬來西亞經濟停滯不前，衍生後續的治安問題、民生問題，皆令馬來西亞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的窘境。以馬來族群為優先的經濟政策，讓他族人民的都嚐盡苦果，其中印度族群更是遭到邊緣化。

1997年金融危機，以及後來擔任馬哈迪副手的安華（Anwar）入獄，所形成一股訴求改革的力量，當時被稱為「烈火莫熄」（改革一詞在馬來文稱為 Reformasi）運動。這項運動在1999年展開，其對國陣的族群政治，並無法撼動。1999年，2004年的選舉，國陣仍然是一枝獨秀。「烈火莫熄」的效應在2008年才呈現效果，該次選舉在野的聯盟，拿下檳城州、吉打州、吉蘭丹州、霹靂州與雪蘭莪州的政權。這亦造成當時的首相阿都拉（Abdullah bin Badawi），在巫統領袖的壓力下宣佈退位，由副首相納吉（Najib bin Abdul Razak）出任馬國第六任的首相。2013年，納吉雖無法讓國陣重回三分之二的局面，但是成功抑制了在野力量的擴展。突破國陣的三分之二是否令華人在馬國的發展不再受制於族群政治？本文認為目前仍無法扭轉這個局面，基本上這股力量仍是老樹盤根的在這片土地之上，於文後詳加闡述。

2018年國陣和希望聯盟（簡稱希盟）陸續公佈各自國州議席的候選人，雙方爭取選民支持，以便能夠成為十四屆大選後的執政者，入主中央。這一戰對兩個陣營來說都是十分關鍵的，尤其是在野的希盟，若這一戰慘敗，未來可能需要五至十年才能恢復元氣。同樣的情形，若發生在國陣的話，可能會導致國陣在失去政權之後，可能面臨土崩瓦解的窘境。因此，兩個陣營都不敢掉以輕心，全力爭取選民的支持。

airiti

國陣在這一戰中，仍然占上風，主要是作為十三屆政府的國陣擁有執政的優勢和豐富的行政經驗。就國陣而言，5月9日之戰，較為艱困的是昔日的巫統領馬哈迪加入在野陣營，把納吉的如意算盤打亂。在野黨在伊斯蘭黨正式與整個在野人民聯盟分道揚鑣之時，在野黨士氣相當低落。後來馬哈迪脫離巫統成立土著團結黨，並加入在野陣營組成希盟，致使政黨局面產生變化，且因馬哈迪其不斷公開批評納吉施政缺失，並一直點出納吉許多問題，而扭轉整個政治局面。

希盟成功在5月9日的全國大選擊敗國陣，以簡單多數122席國會議席（希盟聯合沙巴人民復興黨）執政中央。國陣的慘敗，基本上是敗在自己手上，首先是巫統再度分裂，包括馬哈迪等領袖的離開，再加上原來的人民公正黨，讓巫統的政治力量開始減弱。國陣敗選另一個原因是先機盡失：巫統領馬哈迪，對於這次選舉是患得患失，錯過了2017年，在野黨分裂與士氣低落的良好時機，反而提供充裕時間讓馬哈迪與在野力量結盟與佈局；另一方面，納吉誤判伊斯蘭黨能夠瓜分在野黨的選票，最終卻是巫統的支持力量被伊斯蘭黨所侵蝕，讓該黨不但保住吉蘭丹州政權，更進一步從巫統手中奪下登嘉樓的州政權。

戰術上，巫統、馬華公會、民政黨和印度國大黨等的選舉策略，根本無法讓人民有感，只是呼籲要維護馬來人權益、華人在內閣有代表，抑或支持國陣才有穩定。這些都是老掉牙的口號，完全不接地氣，而執政黨完全漠視人民的訴求。在提名和競選期間，一些選舉的議題，如人民公正黨峇都區國會選區候選人蔡添強被拒絕提名、郵寄選票等等問題，都加深人民的不滿，進一步催出在野的支持力量。

希盟成功執政中央，除了守住檳城和雪蘭莪兩州外，進一步取得森美蘭州、馬六甲州和柔佛州。上述州屬都是馬國富庶的區域，讓希盟擁有中央及地方的資源來推動國家的改革，以及壯大本身的政治勢力。後來希盟在國陣議員跳糟下，取得霹靂州、沙巴州和吉打州的執政權組成州政府。

2018年5月9日，希盟完成馬國政治史上的第一次政黨輪替，政權的和平轉移，亦顯示這個國家民主的進步。從1990年的46精神黨，曾經聯合在野力量撼動國陣，但是最終以失敗告終。歷經28年的時間，今天才看到政黨的輪替，雖然遲了些，但是也為這個國家帶來的希望的曙光。國陣失去政權，並不代表族群政治的土崩瓦解，因為希盟能夠取得政權，亦某種程度上靠著族群政治的模式來獲得各族群選民的支持。希盟的選舉戰術，仍是部份採用族群政治模式，其中包括了馬哈迪設立土著團結黨，以此來跟巫統、伊斯蘭黨競爭傳統的馬來選票，民主行動黨主要是吸納華人選票和少部分其他族群的選票，誠信黨是爭取城市馬來人的選票，而人民公正黨則是積極取得各族群支持。馬哈迪另一方面，則是與沙巴民族復興黨結盟。從希盟與其盟友的戰術來看，其仍存在族群政治的模式，馬哈迪的政治佈局，加上希盟的號召力，以及民心的普遍不滿，讓選舉出現了很大的轉變。不管如何，成功推翻國陣是突破族群政治的一個好開始，希盟未來應該朝「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目標努力，讓馬國人民不分彼此為這一塊土地打拼。這是否代表未來會終結族群政治？而華人能夠擺脫族群政治，族群本身有新的發展？

然而事與願違，2018年的政黨輪替只是南柯一夢，2020年2月底，希盟分裂，馬哈迪上演離辭的戲碼，導致希盟下野。

2020年3月1日，從土著團結黨與人民公正黨分裂出來的國會議員與國陣、伊斯蘭黨和砂拉越聯盟，組成聯合政府，稱為國

airiti

民聯盟（簡稱國盟），在馬來西亞最高元首的委任下，代表土著團黨的慕尤丁（Muhyidin bin Haji Mohammad Yassin）成為馬國第八任首相。在整個內閣的人事安排中，華人與印度人，各自有一位出任正部長的職位，華人正部長，就是由馬華公會總會長魏家祥出任交通部長。整個內閣的人事安排，馬來人正部長佔了逾八成，而馬來人在沉寂一年多後，再次重新「復活」。族群政治重臨馬國政治舞臺，而且是「加強版」，這對非馬來人而言是一大挫敗，而族群政治繼續演變下去，將會激化族群之間的矛盾，這在顯示馬國的族群政治仍然具有雄厚的力量，而華人希望的多元與公平還是一個夢想。

## 肆、結語：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之夢

從馬來亞至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已獨立建國逾一甲子，族群政治尚在繼續分化著人民，馬來西亞此國家已失去許多的競爭力與機會。1969年的流血衝突，讓馬來西亞的多元路線，再次遭遇挫敗。1969年至1989年間，馬國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薩和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將族群政治的結構不斷強化，而使巫統成為這個結構中的獨大者，支配馬國的所有資源。1990年巫統分裂，該黨的一部人離開巫統另組46精神黨，當時似乎能夠挑戰巫統的地位，但是馬哈迪利用族群和宗教議題，成功化解這次的危機，並重挫46精神黨的銳氣。

馬哈迪是政治權謀的高手，其成功擊潰46精神黨，使得國陣在1990到2007年，再度維持十多年的強盛期。2008年在野黨聯盟成功取得五個州議席的政權，但是戰果於2013年受到納吉為首的執政黨的抑制。2018年選舉，國陣領袖納吉面對貪污的指控，

再加上他一直錯誤判斷政治形勢，導致他失去許多致勝的先機。原本分崩離析的在野黨，在馬哈迪加入該陣營，成功凝聚士氣和在野的力量。

2018年5月9日，國陣的失敗，顯示了馬來西亞人民從2008年開始醞釀的不滿情緒並未被執政聯盟正視。國陣忽視民意，納吉提倡的「一個馬來西亞」(Satu Malaysia)欲爭取各族的支持，但是國家政策並沒有實質的變革，馬來人優先仍凌駕在「一個馬來西亞」之上，這根本無法讓華人和其他族群所認同。2018年馬來西亞成功出現了政治上的首次政黨輪替，在野黨的希盟(人民公正黨、土著團結黨、民主行動黨和誠信黨)登上執政的殿堂，但是這是否為華人帶來更多的改變？而族群政治真的被打破了嗎？馬國的民主已邁向新的一頁？政黨輪替可說是一個轉變，但是似乎無法改變根深柢固的現實。

執政逾半個世紀的巫統，因為政權輪替顯得不知所措，導致2018年大選過後，黨內出現紛爭。前後陸續有17名國會議員退黨，巫統面臨創黨以來最大的危機。巫統最後選擇與伊斯蘭黨結盟，組成一個馬來人的聯盟，以訴求捍衛馬來人權益來尋求馬來人的支持。顯而易見，2018政黨輪替並沒有擊潰族群政治，因為巫統和伊斯蘭黨結盟，鼓吹馬來人至上，基本上仍依靠族群主義來重新取得政權。如今馬國的政治，仍然充滿對立的危機，而華人要突破族群政治的努力，似乎只前進了一小步。馬來西亞的民主發展，目前還是無法與族群政治脫勾。華人的群體意識還是停留在華人社會，於馬來族群而言，群體意識為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其國家的群體意識是以馬來人為主。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在1960年代提倡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對目前的馬國政治形勢而言還是奢求。



2020年2月底，族群政治再度回到馬國的執政舞臺，馬來人至上的族群政治再度成為馬國政治的主弦律，而非馬來人被嚴重邊緣化。如此轉變顯現，族群政治的根基仍深，馬國未來的政轉變取決於馬來人的政治覺醒。如果最大的族群仍沉睡在族群本身的保護傘，這將埋下馬國政治、經濟、教育的隱藏危機。族群政治再次拒絕了多元路線，而馬國的未來是舉步為艱。馬來人意識的高漲，只會讓華人與印度人結盟，高舉各自的族群認同來與馬來人相抗衡，這會導致族群鬥爭日漸激化。2020年3月中旬至2021年7月，馬國新冠肺炎疫情時好時壞，該國多次的封城封州導致經濟重創，而這可能加劇政治的角力和族群之間的矛盾。後新冠疫情，馬國政治議題會一直在演變，但是仍離不開族群議題，其族群政治的特質相當值得研究者來共同參與。

### 中文書目

- 〈全國大選報導〉，《南洋商報》1969年4月6日。
- 〈事件報導〉，《南洋商報》1969年5月12日。
- 〈事件報導〉，《星洲日報》1969年5月15日。
- 〈馬來西亞513事件〉，《星暹日報》1969年5月15日。
- 王甫昌（2002）。〈第八章：台灣臺灣的族群關係研究〉，收錄於王振寰主編，《台灣臺灣社會》。臺北：巨流，頁233-274。
- 王國璋（1997）。《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
- 莊國土（2003）。《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化》。廈門：廈門大學。
- 吳祖田（1995）。〈馬來西亞的族群衝突與整合〉，收錄於邵宗海、楊逢泰、洪泉湖編撰，《族群問題與族群關係》。臺北：幼獅，頁251-265。
-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前衛。
- 胡昌智（1992）。《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
- 陳國賁（2005）。〈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沖突和融合〉，《浙江學刊》2：153-159。
- 黃瑞祺（1996）。《批判社會學》。臺北：三民。
- 葉玉賢（2010）。〈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初中「歷史科」教科書之分析（1973-2007）1：一個馬來西亞華人「中國性」轉變之觀點〉，《課程與教學季刊》，13，4：159-187。
- 薛莉清（2015）。《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北京：三聯。

- 顏清滄 (2005)。《海外華人的社會變革與商業成長》。廈門：廈門大學。
- (2008)。《東南亞華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

### 中譯書目

- Ritzer George (1995)。《社會學理論》，馬康莊、陳信木合譯，臺北：巨流。

### 英文書目

- Berita Harian*. May 15, 1969, Peristiwa Mei 13.
- Goh, Cheng Teik (1971). *The May Thirteenth Incident and Democracy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STP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1990). *Elections in Malaysia: A Handbook of Facts and Figures on the Elections 1955-1986*. Kuala Lumpur: NSTP.
- Ratnam, K. J. and Milne, R. S. (1967). *The Malay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of 1964*.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1969). *The May 13 Tragedy*.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 The Straits Times*. May 15, 1969, May 13 Racial Riots.
-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1969). *May 13-Before and After*. Kuala Lumpur: Utusan Melayu Press.

##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the Evolution of Democracy: Group Consciousness Constructed by Ethnic Politics**

Leong-Sze Lee, Wan-Ching Peng

Professor and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Project Officer, Research Center for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From being called “Chinese workers” to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n “Chinese” now, we can see that the change of identity of “immigrants” in this action and the identity, ethnic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a group are the mechanism for influencing the functioning of a country of migrati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group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 is of course changing wi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ci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obviously,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now have their own Chinese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appearanc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Chinese. It also produces different group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in various countries.

Malaysia’s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2018 represents the success of a long-standing challenge to ethnic politics by non-Malaysians, and results are obtained in 2018;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some Malays. So in fact the election results are not only a struggle for a single ethnic group,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multi-ethnic group on the politics of the national ethnic group. This paper wants to tak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Malaysia, and combines sociological theory with the evolution of Malaysian political history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national polici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nto the national society (groups). And wit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discuss what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on the group consciousness of Malaysian people (especially Chinese) is in recent years.